

包遵彭
李定一
吳相湘
編纂

中國近代史論叢

第一輯
第七冊

——
維新與保守

正中書局印行

包達彭
李定一
吳相湘
編纂

中國近代史論叢

第一輯
第七冊

——維新與保守

正中書局印行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版初臺月二十年五十四國民華中
版六臺月十年六十六國民華中

輯一第
冊七第

叢論史代近國中

守保與新維——

角五元一 價定本基 冊一全

(費運費運加附埠外)

彭
一
湘
譽
局

遵
定
相
元
書
中

包
李
吳
黎
正

者 纂 編

人 行 發

刷 印 行 發

(號十二路陽衡市北臺灣臺)

司 公 書 圖 成 集 銷經總外海

(號七街海北地麻油龍九港香)

店 書 風 海

(地番六五目丁一町保神田神區田代千都京東本日)

店 書 海 東

(地番八九町前門中田區京左市都京本日)

川(3902)號九九一〇第字業書版局 證記登業事版出局關新
(500)

叙 言

編纂「中國近代史論叢」之鵠的，不僅在彙輯若干論文以供閱讀而已，實另有深遠的寓意。

數十年來國人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並非不辛勤，但成績却並不如理想，除史料浩瀚無涯際與史事紛纒難紬繹的原因而外，研究者不易超脫時代環境所加諸的影響，也是因素之一，儘管成績不如理想，但總是一個時代學者們心血的結晶，它應該受到我們的重視與愛護，它值得被提出來作爲今後研究者的里程碑。

蒐輯史料以廣流傳，整理史料以利閱讀，審訂史料以辨真贋等事，僅僅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工作，但最重要的還是憑藉這些史料去瞭解歷史的真相，闡釋史事的脈絡，尋求歷史的知識，纔是歷史研究的目的。我們要結算數十年來國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成果，當然祇有從他們的論文中去找答案。研讀過這些論文之後，目前從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士不致陷於無處着手或枉費功夫的苦惱中。

要周覽這些學術論文確非易事，因爲它們多散見數十年來各種期刊之中。經此次大動亂，中華民國現在所保存者，幾已成孤本，存留大陸匪區者，則遭有計劃之銷毀。我們豈能任這些可珍貴的學術成果湮沒而不能流傳？本論叢所輯的雖未必完備，但循此途徑，必可達到保存數十年來國人研究中國近代史成果，並爲今後研究中國近代史學者樹立里程碑的目標。

尤有進者，共匪正在大陸瘋狂進行廣造中國歷史的工作，特別重視的當然是中國近代史。他們一方

面輯印經過刪改後的史料，一方面歪曲這些史料，撰寫成符合俄寇利益的歷史。進行這項工作時，必須先消滅以往學者在正常情況下的成績。羅爾綱被迫完全否定自己從前的研究結論，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參看本論叢第一輯第四冊導論）。這樁例證，更加强我們要編纂本書的決心，更警惕我們認識自身責任的重大。

在編纂的過程中，我們對以往國人在中國近代史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曾略加檢討。所以每一冊的前面，都撰寫導論，除掉介紹內容外，並將我們對該問題研究的見解提出。

創造時代者必先瞭解他所處那個時代的真相與淵源。祇有在明白過去苦難的所由來以後，纔可能為將來帶來新幸福；沒有不接受前人經驗的民族能繼續自由獨立地生存在世界上，締造將來的明鏡是對過去作透澈的反省。我們渴求歷史知識的目的在此，特別是中國近代史的知識，因惟有它最能滿足我們對方面的需要，惟有它最能解除我們的徬徨與空虛。所以，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者，不僅應當正視他們這個時代使命，而且必須集中他們的研究工作，努力去達成這個目標。

凡 例

(一) 本論叢每輯分十冊，每冊約十五萬字至二十萬字。以一專題爲中心，選輯近四十年來我國學者專家已發表的有關論文或專著節錄。

(二) 本論叢爲篇幅所限，故各論文原有之註釋除特別需要者外，均刪去不錄。

(三) 每論文末均註明原載書刊名目發表年月，讀者有需要時，可自查對。

(四) 本論叢第一輯祇選輯國人用本國文字所發表之論著，本國學者用外文撰寫之論文或國人翻譯外國學者之論著，均不輯入。

(五) 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在臺灣省印行之有關論著，爲避免重複計，均不選入本論叢第一輯中。本書編者有關論著，亦不輯錄，只存其目，以便儘量容納各家論文。

(六) 本論叢之目的在保存原作者之見解，故對所輯各論文之論斷並無贊同或反對之意。

(七) 本論叢編輯過程中，承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與中國文學系圖書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國史館編輯委員會圖書館、國立故宮博物院、陽明山莊圖書館等及其他私人藏書家給予協助，謹此誌謝。

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二輯目錄預告

(一) 近代教育

(二) 近代學術思想

(三) 近代社會經濟

(四) 近代政治

(五) 近代臺灣

(六) 湘軍、淮軍、新軍

(七) 厘金、關稅、鹽稅

(八) 華僑問題

(九) 邊疆問題

(十) 不平等條約與平等新約

導論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原是我國往昔先賢的明訓。「忍辱負重，屈以求伸」，更是漢唐盛世建國的初基——不幸南宋以還，士大夫論政論事，竟祇憑囂張的意氣，作虛僞的高調。遇有對外交涉更不研究對方情勢，審度本身力量，徒然以和爲辱以戰爲高。從此積成習氣，錮蔽人心七八百餘年。逮清乾隆時復以「十全武功」自我陶醉，益使朝野充滿惟我獨尊盲目驕誇的心理，對於本國各方面的優劣，既沒有作一平心靜氣地檢討；對於本國以外的世界事務，復不屑予以注意或研考；殊不知當時歐洲人卻已窺破中國外強中乾的實情，俄英競逐的鉗形侵略攻勢已在積極部署了。

鴉片戰爭以後，林則徐魏源苦心孤詣輯錄「海國圖誌」，介紹西洋各國情況，提倡「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同時也指出我國朝野必須「去僞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才可以真正覺悟，切實努力。

這可以說是近三百餘年來，我們第一次平心靜氣所作的知己知彼工夫。雖然在知彼知己兩方面都不够深入，但在南宋以來「虛僞」痼疾的環境裏，有此一書梓行，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不幸國內絕大多數的朝野人士仍舊不肯虛心領受這失敗的教訓。當然更談不上注意或接受「海國圖誌」的內容和主張了。但日本朝野卻因這一「海國圖誌」得到新啓示，奠立其明治維新運動思想基礎。從此，中國和日本對西方各國的關係也開始分途發展。

五口通商以後，上海漸成中外貿易中心，劃有租界，以居外僑。當太平軍竄擾時（咸豐十年即西曆一八六〇年），上海縣城僅有官軍千餘人，實力薄弱；而外國人則組織自衛武力以保護租界的安全，武器士氣均極犀利旺盛；這一鮮明對照給予當地人士極深刻的印像，因之，著名士紳馮桂芬等即極力倡言放棄鄙視外人成見而謀協力之利，乃發起組織會防局辦理中外交涉。

二三年主持會防局的實際經驗，馮桂芬更加認識本身的缺點和外國的情勢。因於咸豐十一年十月（一八六一年）寫成「校邠廬抗議」一書，敷陳其對國是的新見解。

「校邠廬抗議」著重指出虛僞議論絕不能援外，必須「實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強？我何以大而弱」？換句話說：就是面對當時新局勢，我們必須切實作一知己知彼工夫。據「抗議」指陳：我們中國的缺點約有數端：①人無棄材，不如夷。②地無遺利，不如夷。③君民不隔，不如夷。④名實必符，不如夷。這四點是必須反求諸己：「惟皇上振刷紀綱一轉移間耳」。至於軍旅之事：船堅砲利不如夷，有進無退不如夷；而人材健壯未必不如夷。是夷得其三，我得其一，故難勝。然就此三點：其中二端（即精神與體格訓練）亦道在反求諸己，惟船堅砲利一事有待外求。

這些議論，可以說確是虛心檢討窮本探源之論，其深入廣博的程度顯然比較「海國圖誌」是更進一步了。

基於這些認識：「抗議」主張「采西學」、「製洋器」，不祇是局限於製船製砲，同時且倡議應用西人耕具來墾荒、開礦以籌「國用並」。且大聲疾呼：科學時文（八股）「斷不可復以之取士，窮經經

通，此其時矣」；力主在考試科目與內容上養成政治上社會上踐履篤實的風氣及經世致用的實際有用人才。

以今看來：這些主張實在都是平實之言，然而在九十餘年前是被視作大膽妄言的。因之「抗議」寫成了，不敢公開印行；曾國藩李鴻章等雖然非常尊重馮氏的主張，也格於君主專制及守舊時勢，不敢大有作為。幸清廷發現俄人利用英法聯軍戰役攫取我國土的陰謀，並窺破俄人所謂以武器援我的真意實在伸張其勢力至長江流域。同時：英人爲與俄人競逐，亦迅速改變其砲艦政策，轉向清廷表示願以船砲協助救平太平軍。於是「自強運動」即在這一內外相激相盪的情勢下展開。

太平軍的救平，洋兵洋槍雖有助力，但曾國藩的湘軍有統一的意志、有爲保衛中華民族文化而戰的目標，尤其是「拙」「誠」的精神領導所產生的腳踏實地的風氣，實在是取得最後勝利的決定因素。可以說這是魏源馮桂芬輩主張「反求諸己」及「采夷人長技」同時並重的具體微驗。應該是給予當時人以新啓示的。不幸金陵克復以後，「同治中興」的頌揚，又使原來頑固守舊虛憊的議論與宮庭中滿漢成見及「內輕外重」的憂慮相融合，形成一股更囂張的所謂「清議」——事實上：這種「清議」祇是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發生，頑固守舊人士爭先恐後放言高論以逞快於一時，以致躬蒞現場根據事實處理此案的直隸總督曾國藩竟爲朝士集中攻訐的對象，支持國藩最力的恭親王更遭其弟醇王無情的打擊。其最直接最迅捷的影響，即守舊派力請停辦一切模倣西法的製造局造船廠等自強新政設施。

經過李鴻章的慷慨陳詞，原有的造船廠製造局暫仍保留。但關係造船起碼根本的開採煤鐵礦與建築鐵道計劃，卻從此使李鴻章噤不敢再言，甚至清廷最高統治者兩宮皇太后也不敢有所主持，當時守舊反動勢力之強大可以想見了。

接近代的軍隊是需要近代化的工礦實業及交通支持的。同時更需要政治、教育、社會各方面的革新以作基礎的。正如郭嵩燾在光緒三年（一八七八年）所指陳的：「泰西用兵，教之有其本，習之有其程，君臣上下並心一力以講武爲事，風俗成而人心亦定矣」。換句話說：歐洲各國徵兵練兵是有其深厚的政治教育基礎的，決不是我國千餘年來重文輕武的積習以及清廷「不以兵權假人」的君主專制勢下所可同日語的。因之，郭氏就其在英國實地考求心得，特別提醒當時主持自強運動的李鴻章：「方今治國之要，其應行者多端，而莫切於急圖內治以立富強之基」。「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同時更強調朝廷大臣必須毅然以先知先覺自任，則政教明，士大夫之議論自息。

抑不特此，郭氏且以日本留英學生多習鐵道探礦技藝律法、講求經制出入，謀盡倣效行之，絕少學兵法的事實提醒當政者的注意——郭氏這番議論，一方面指出我國自強運動的不徹底，甚至是本末倒置，同時也指出中國日本在取法西洋力求近代化的途程上自始就是走的兩個不同路線。

不幸女主（慈禧）當政，宵小弄權，李鴻章雖處局中，如在局外，無與主持國是，祇能就其權力所及仿行西洋兵法，儲養一二人才而已。對於郭氏建議不敢採納實行，而頑固守舊人士尋且以郭氏的坦白言論是「有二心於夷」，群起攻擊，終使郭氏去職。守舊派氣餒困之益熾。

光緒六年，日本侵我琉球，俄人踞我伊犁，海防塞防同時告急，露張主戰言論瀾漫國內，劉銘傳針對當時「論者動曰用兵」的情勢，慷慨上言，指出用兵之道首在審察發情：俄人所以挾我，日本所以輕我，皆以中國守一隅之見，畏難苟安，不能奮興。且俄人此時之持滿不敵，非畏我兵力，實因其西伯利亞鐵道尚未築成，如果我國不急起直追：「不出十年，禍且不測」！因之，劉氏鄭重建議：練兵製器，固然是自強要政，然其機括則在於急造鐵路。如果鐵道開築，東南西北呼吸相通，防海防邊，轉運槍炮，朝發夕至，十八省合爲一氣，一兵可抵十數兵之用；不僅可以抵禦外侮，並且「將來兵權餉權俱在朝廷，內重外輕，不爲疆臣所牽制矣」。

以今看來：劉氏此論，僅限於建鐵道一端，其所涉及範圍顯較郭氏建議遠爲狹小，且所謂「內重外輕」云云，更是針對宮庭心理弱點，力求打破虛僞言論與此「內輕外重」論調之合流，設想周到，用心良苦。如果當時朝廷及士大夫能真正領悟這一建議的重要性，則我們在建設鐵路充實邊防上可以與俄人並駕齊驅。然而頑固守舊人士竟仍多方加以阻撓，直到十年以後，局勢更急，清廷才開始在東北築路以抗俄人。可是光陰一去不復返，我們在時間上已落在俄人之後了。

清廷朝野的因循坐誤，對於我們民族國家的近代化既產生如此重要的惡劣影響。但更嚴重的是當時一般不了解時代的危險和國際關係運用的朝士大夫，始終祇知逞一時意氣，博個人的虛譽，經常地輕舉妄動「打草驚蛇」，結果卻益增中外關係的複雜與緊張，並破壞自強運動的成果。例如光緒初年中法越南交涉即充，分表現放言高論紙上談兵的士大夫誤國債事之甚，而自強運動中較具成績的福州船廠即不

幸成爲這次「清議」的犧牲品。

第一次中日戰爭（甲午戰爭），可以說就是中國自強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運動成績的競賽，結果很顯明地暴露我們本末倒置，「無根之花」是經不起風雨打擊的。而俄人在戰後藉口中國鐵路太慢，要求「借地」建築中東鐵道及其支線，企圖利用這鐵道作束縛中國的「鐵鍊」、侵略中國的「剪刀」，更顯出我們不能應用鐵道的正面利益，敵人就要反其道以行了。瓜分之禍因此迫在眉睫，於是康有爲梁啓超倡導「全變」「速變」的戊戌維新運動就在這一情勢下演出了。

自戊戌以來，康梁是最喜誇言「首倡變法的」。但以今研究：早在康氏萬言書上達「御覽」之前七年，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就已經光緒帝留心講求了。至康氏「全變」之說亦即不以摹倣西技采用西器爲滿足，而實欲推行西洋之學術典章法度，其觀點殆與光緒三年郭嵩燾的主張相合。換句話說：康氏當時的主張要不過是集馮（桂芬）郭（嵩燾）倡導「窮變通此其時矣」言論的大成，並非新鮮創見；因之，在時間上說：我們民族至少又喪失了二十餘年的寶貴光陰！但如果當時朝野真正覺悟切實施行，亡羊補牢，尙不爲遲；不幸這一維新運動竟只百日壽命就夭折了。

戊戌維新運動不幸演成政變，原因是很複雜的。正如葉昌熾所指陳：「康梁之案：新舊之爭，旗漢之爭，英俄相爭；實則母子相爭，追溯履霜之漸，則又出於嫡庶相爭」。唯其如此，在戊戌政變之後，因又繼續演出「己亥建儲」「庚子拳亂」。

「庚子拳亂」，可以說是我國頑固守舊勢力的總動員；頑固的清廷執政者利用頑固的士大夫和民間

迷信集團——義和團匯成一股力量，以「扶清滅洋」相號召，他們以為滅了洋人，他們各派的公私目的都可能達到了——但嚴格說來：拳匪的行動也可以說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三個救國救民族的方案，不過這方案是反對西洋化近代化的，與第一（采西人船堅炮利）第二（采西學西政西法）兩個方案是背道而馳的。

就我們民族幾千年來的歷史看來：有一重要的歷史教訓值得我們記取的，就是我們民族遭遇外患時，是必須痛下知己知彼工夫，並且不惜探敵人之長以擊敵的，漢代擊潰匈奴就是一衆所周知的例子。唯其如此，我們對於頑固守舊份子及愛國志士和民間迷信集團結合而掀起的義和團運動，是不能予以同情的，甚至我們也不願用「愚忠」兩字來形容他們的言行，因為真正忠於民族國家的人決不是只憑虛懦意氣的。事實上：他們愚不可及的行動，幾乎將我民族國家作孤注一擲了。而不平等條約束縛的更加嚴厲，以及民族自尊心經此打擊而形成一種民族自卑感的變態心理，更是這一行動的最直接的不幸影響。

一次、二次的救國救民族方案之所以終歸失敗，國內強大的頑固守舊勢力的百端阻撓，固然是一主要原因，但倡導維新變法運動主角本身的「知己知彼」認識不夠深刻，也是一重要因素。本書所輯梁啟超氏的「晚清學術概論」及蔣方震氏的「清代學術概論序」，可以說就是局中人坦白的自我檢討，是值得注意的。至於梁蔣兩文均以當時西洋留學生沒有參加維新及晚清西洋思想運動為憾。事實上：這正是當時清廷的留學政策及介紹西洋科學原則使然：「近代中國留學思想之變遷」及「八十年來官辦編譯事業之檢討」兩文於此可有部份解答，同時也足以增訂梁氏之所言。

雜誌是報導和介紹學術思想及研究成績的最好工具。在我國學術文字最初具有論文形式的，應以光

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創刊的國粹學報中所載的爲最早，於今不過五十一年，然而這「國粹學報」早已夭折了，雖其後「中國出版之雜誌，逐年增加，而質量亦日有改進；所惜者，各刊多歷史不甚長久，中途停刊者居多」（「一百二十年來之中國雜誌」）因之，我們檢閱這一雜誌類目或「國學論文索引」與「民國學術論文索引」等後，我們發現在每種科目之下，不能顯示一種系統的知識和趨向，總合每種曾經努力的科目以觀中國文化史，看不出全部文化的連續性——二三十年來，在高唱「整理國故」「復興中國文化」的聲浪中，我們的成績如此，實在值得警惕。

「郭嵩燾之出使歐西及其貢獻」、「七十年前之維新人物——馮景亭（桂芬）」、「張蔭桓事蹟」，是錢述三位努力維新運動先知先覺的奮鬥事實。他們的志行，特別是不顧頑固守舊勢力的阻撓與打擊的精神，以及他們當時超時代的見解，即在今日仍舊是值得景仰效法的。

「康有爲與戊戌變政及政變」、「譚嗣同的仁學」、「戊戌變法時反變法人物之政治思想」三文，是說明這一近代史上大事件的真相一斑，同時也提供「新」「舊」兩派思想歧異之所在。至於「康有爲思想之兩極端」指陳：當時維新運動主角並沒有實地觀察歐美國家強弱之所在，深切作知彼工夫，故其國是見解不是真知灼見的定論，以致自相矛盾，不能達到救國目的。

「維新運動的反動」分析庚子拳亂所以形成的原因至詳，而「中國近世史上的教案」與「教案史料編目序」均係教會設立之學校刊行的專籍，其於「民教相仇」原因所作的坦白檢討，確是平心靜氣之論。我們選錄這兩篇文章不僅在提供讀者以史實的分析研究，更重要地是希望國人對於中外關係均能如此。

平心靜氣地檢討，切不可再蹈「虛僞」史論的舊套。必如此，中外關係才可以在正軌上進展，我們先哲前賢的「世界大同」理想才可實現。

庚子拳亂以後，外國旅行家足履北平，目睹一方面是黃瓦燦爛高壁層樓莊嚴深奧的中國皇城，而一轉目則為破館奇拔深壕厚壁的各國使館炮壘與相對峙；因有認為這是「世界第一奇觀」的。而我國人經行其地目擊心傷的更有人在。「辛丑條約第七款實行之經過」是根據檔案敘述這一「奇觀」形成始末。當時外國政府「報復」「膺懲」的心理由此可窺見無遺。但很顯明地：這種「報復」「膺懲」政策是極端錯誤的。民國十三年六月蘇俄使共匪發動「反帝運動」以及民國三十年以後日本軍閥與汪偽政權的「中日親善」宣傳都是以這一「奇觀」為中心題材，足見當時各國脅迫清廷簽訂辛丑和約種下「惡因」影響現代之深切。

無論自任何意義上說：義和團之亂對於近代中國的影響都是非常鉅大的。就是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說：這也是一非常艱鉅的題目，原因是其牽涉之廣，史料之繁；特別是策動這一變亂的主角——清廷於事後為諉卸責任曾用力竄改刪除若干史料！官書既失諱，私記則又流於濫，大多道聽塗說一隅之見聞，因之就有關拳亂的中文史料說：考釋辨疑工作是最重要的。本書所錄「所謂『景善日記』者」即是就中外人士同感興趣的一種史料予以考訂，藉示一例。

總之：自海通以來，特別是近二百餘年來的歷史鮮明顯示：內政外交之相為表裏互有影響，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必須通盤檢討徹底革新，才能適應這新時代——不幸國內一般士大夫始終狃於保守的

成見，不肯切實作知己知彼的工夫，以致坐失時機，誤國禍民。甚至「九一八」以後，「虛偽」高調，較前且更甚。

推究這種情勢之所以始終未有改善，中國史學界也是難辭其咎的。因為近三四十年來，有關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大多偏重於中外關係的演變，而很少有人致力於國內政治、教育、思想、社會、經濟各方面變化的；以致一般國人對於新舊之辨與中西文化異同及其優劣不能有所認識，當然更說不到領悟歷史的教訓了。

編者於纂輯本冊時，原抱有頗大的希望；然四處搜羅結果，發現甚多空隙；在這一「里程碑」面前，史學界同仁的責任實在太重大了！